



20th
太阳鸟文学年选
二十周年
1998-2017

2017 中国最佳 短篇小说

主 编 | 王 蒙
分卷主编 | 林建法
林 源

太阳鸟文学年选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th

1998-2017

太阳鸟文学年选

2017
中国最佳
短篇小说

主 编 | 王 蒙

分卷主编 | 林建法

林 源

© 林建法 林源 20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7中国最佳短篇小说 / 林建法, 林源主编.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8.1
(太阳鸟文学年选 / 王蒙主编)
ISBN 978-7-205-09159-0

I. ①2… II. ①林… ②林…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77597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1 (邮 购) 024-23284324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http://www.lnpsh.com.cn>

印 刷: 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印刷厂

幅面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8

字 数: 310千字

出版时间: 2018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艾明秋 高 丹

装帧设计: 丁末末

责任校对: 吴艳杰 耿 珺 郑 佳

书 号: ISBN 978-7-205-09159-0

定 价: 56.00元

“小说是灵魂的逆光”

——《二〇一七中国最佳短篇小说》阅读札记

梁 海

苏童在谈论短篇小说时，曾作过这样的描述：短篇小说很像针对成年人的夜间故事。深夜挑灯，在临睡前借助一次轻松的阅读，摸一摸这个世界，让一天的生活始于平庸而终止于辉煌，多好。我想，对于读者而言，与长篇小说相比，短篇小说的确是“轻松的阅读”；但对于作家而言，短篇小说的创作却并不轻松。短篇小说的文体是非常富有内爆力的，作家要在一个极其狭窄的叙事空间里建立起与存在世界对话和思考的方式，要求的“技术含量”相当高，它是要“戴着镣铐舞蹈的”。一部优秀的短篇小说总是能在极其有限的叙述里，表达没有限度的思想和情感，呈现出简洁而浩瀚的艺术魅力。这对作家的叙事功力极具挑战性。或许，正因为如此，尽管短篇小说无论是在文学场域内还是场域外，都没有长篇小说那样宽广的发展空间，但还是有一大批作家痴迷于短篇小说文体，坚守短篇小说的创作阵地。毕竟，每一位优秀的作家都在内心深处有着追求艺术极致的文体的自觉。

本书中收录的17个短篇，都是林建法、林源先生精心遴选的，这些短篇小说文本管窥一豹般地呈现出了2017年短篇小说真实、生动而丰富的面貌。张学昕教授在《〈二〇一五中国最佳短篇小说〉阅读札记》中写道：“建法兄每年都要以自己近乎苛刻的判断，兢兢业业地选择出一些好的文本，挑出他认为可能成为未来经典的‘另类’文本。我知道，这里面埋藏着他对于文学的真诚和赤

子之心，也镶嵌着他‘倔强’的美学和情感的伦理，以及有关文学道德力量的承诺。”^① 本书中的17个短篇，再一次彰显了林建法、林源先生精准、睿智的审美判断力。从总体上看，2017年的短篇小说创作出现了许多新的元素，出现了一些令人欣喜的变化，许多作家找到了新的叙事元素，在文体探索上有了比以往更多的突破。小说家们以更加自信和从容的方式，逐渐找到了自己与现实、存在对话的方式，形成了各自特异的美学风格。

“次级内嵌”式短篇小说

我注意到，2017年的优秀短篇创作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大胆锐利的文体探索。多线索叠套式的结构、元叙述等多重叙述圈套在同一文本中的交集，使得作家在深度介入生活的同时，以文本探索对时代进行了多元化的思考。在他们充满玄机的叙述道场中，去破解关于生活、关于人性、关于存在的诸多难解的奥义。

苏童的《玛多娜生意》无疑是2017年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之一。苏童在谈《玛多娜生意》的写作时提道：“一个好作家对于小说处理，应有强烈的自主意识。他希望在小说的每一处打上某种特殊的烙印，用自己摸索的方法和方式，组织每个细节、每一句对话，然后遵从自己的审美态度，把小说这座房子构建起来。这一切都需要孤僻者的勇气和智慧。作家孤独而自傲地坐在他盖的房子里，而读者怀着好奇心在房子外面围观，我想这就是一种艺术效果，它通过间离达到了进入（吸引）的目的。”^② 基于如此的叙事策略，《玛多娜生意》的先锋性是显而易见的。文本的开篇，主人公庞德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口口声声要与著名歌星玛多娜谈生意，结果忙乎了几个月连一个像样儿的合同也没签上，公司倒闭。庞德跑到深圳，回来后竟摇身一变为热带风暴演出公司的法人、董事长、总经理，策划了一个聋哑人手语辩论大赛，结果又以失败告终。失魂落魄的庞德消沉了没几天，听说歌星玛利亚·凯莉到香港，眼睛一下又放了光，最

^① 张学昕：《珍视我们勘察生活的眼角——林建法、林源主编〈二〇一五中国最佳短篇小说〉阅读札记》，《东吴学术》，2016年第1期。

^② 苏童：《小说是灵魂的逆光》，《纸上的美女》，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

后自然还是不了了之。数次失败的庞德绕了半个世界回来，竟成功地将身份置换成一名新西兰葡萄酒酒庄经理。庞德的人生似乎永远是错位的，一次次失败换回的是更加无休止的折腾。我想，现实生活中的庞德并不鲜见，或许还不少。时代的浮躁和焦虑通过庞德的身心传递给我们，令我们环顾周遭，蓦然发现别人或者我们自己深藏的污垢。在整个阅读中，始终困扰我的是，为什么苏童给这部短篇小说的起名为“玛多娜生意”？文本中，玛多娜从未正式出场，她仅仅是一个关于存在的符号，犹如都市广场上飘忽不定的霓虹灯广告。文本中真正出场的女性只有酷似玛多娜的庞德的情人简玛丽和庞德的妻子桃子。庞德的情感生活如同他的生意，同样是虚无缥缈的一片荒芜。他疯狂地追求酷似邓丽君的桃子，等桃子想要嫁给他时，他又转而去追简玛丽，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无论是典型的东方淑女桃子，还是富有西方叛逆气质的简玛丽，最终都抛弃了他。或许，这个时代已经没有什么传统意义上的爱情了，一切都是交易，都是生意。生活和人的灵魂是虚空而荒诞的，其中又填充了许多暧昧不清的东西，正如那个从未现身的玛多娜。如此阐释“玛多娜生意”这篇小说的题目，是否是苏童的本意，我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苏童在叙述中隐藏了“某种特殊的烙印”，让我们读后，有点酸楚，有点沉重。

与《玛多娜生意》相近，艾玛的《白耳夜鹭》也呈现出文本探索的旨趣，而且在阅读上更加“烧脑”。这个文本包裹着凶杀故事的外壳，讲述的却是有关欲望的恶行膨胀。其实，欲望书写早已如“蝴蝶的尖叫”，一次次刺激着我们的耳膜与神经，如果不在文本形式上做陌生化的处理，很容易产生审美疲劳。所以，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必须要以惊人的想象力和虚构能力，吸引读者层层剥茧，去咀嚼思想的内核。《白耳夜鹭》正是这样一部在叙事的剥茧抽丝中，读之令人欲罢不能的作品。文本的叙事线索是多重和复调式的，由于其叙事结构的复杂，我只能借助文本中两个主要的叙事空间尝试一次技术解码。一个是偏远小渔村中李照耀家的小酒馆。在这个小酒馆里，“我”与来自C城的秦后来邂逅，交谈中引出了10多年前发生在C城的一起凶杀案。C城先富起来的木歌与一位古筝老师在江边约会后失踪，虽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但可怕的传说遍布C城：古筝老师的男友“将木歌用麻袋装了，扔进了沅江”。依照我的阅读惯性，下面应该是一次东野圭吾式的推理与智性的博弈。“我”为什么要在10多年

前选择这样一个荒凉的小渔村生活？喜爱拍摄烟囱的摄影家秦后来，为什么也跑到这个没有烟囱的小渔村？为什么与“我”初次相见便提及C城多年前的一起凶杀案？是在试探“我”吗？毕竟，“我”完全具备杀死木歌的动机：木歌的母亲曾经羞辱过“我”的母亲；与木歌约会的古筝老师也是“我”的情人，尽管古筝老师的情人很多。然而，所有的问题与悬念如同一根已经点燃的引线，“滋滋”地在忽明忽暗中燃烧，却始终没有燃尽，没有爆发。在此，我不禁为艾玛的叙事功力叫绝！就在我们因迷失略感绝望的时候，艾玛却在另一个叙事空间为我们撩起了真相的一角。那就是蓝泉墅。在那里，“我”与独守空闺的富豪妻子宁兰芬偷情幽会，貌似闲笔处，却是真正的暗流涌动，潜藏着一个又一个抵达真相的伏笔：宁兰芬亲昵地把“我”叫做“疯子”，还多次提出要雇“我”去杀死勾引他丈夫的“小三”；我的疯狂、放肆，甚至暴虐，便在隐隐绰绰间浮上水面。而宁兰芬一句“疯子，说说看，怎样才能杀死她”，更是在瞬间打开了“我”掩藏已久的尘封之门，“我”马上想到的是，“跟木歌一样，她老公也是个大块头……真要硬生生放倒那么个大个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倏忽间，潜意识便出卖了“我”。那么，“我”是谋害木歌的真凶吗？就在我们极尽“烧脑”之际，艾玛又横刺里插入了一个真实的失踪案：100多年前差一点赶在卢米埃尔兄弟前成为电影发明者的路易斯·普林斯的神秘失踪。于是，历史与当下的互文，再一次增添了解码的难度。直到文本的最后，真相依然模糊不清。毕竟，艾玛不是东野圭吾。悬而未决的失踪案，留给我们的不是惊涛骇浪的追凶，而是掩盖在惊涛骇浪背后回归于无奈与苍凉的平静，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情，正像文本中所引的卡夫卡的那首小诗：“我触碰什么 / 什么就破碎 / 服丧之年已过去 / 鸟的翅膀耷拉下垂 / 月儿裸露在清冷的夜里 / 杏与橄榄皆熟透 / 岁月的善举。”

除了上述三部作品，万玛才旦的《气球》也富有新鲜的“陌生感”，带给我们耳目一新的阅读体验。作为一名电影人的跨界书写，文本在选材、叙述口吻、结构上具有一定的先锋性，影像感十足，这无疑为当下纯文学的创作注入了新鲜的气息。其实，我始终认为，衡量一个作家的创作生命力在于，他能够克服多少叙述的压力和困窘，能否做到匠心独具，能够为我们时代的审美提供多少新的可贵的因子。真正的短篇小说大师，一定会深深体悟到个中滋味，不

断挑战自我创作力的极限。

2

我注意到，这个选本里的多篇作品不约而同地采用了荒诞手法，尽管具体表现有所不同，或写实，或想象，或象征，但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描摹了现实生活中的“走调”“失序”与不和谐，主体上呈现出荒诞现实主义色彩。王德威教授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提出“中国牌的荒诞现实主义”的说法，将“荒诞”与“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指出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现实主义创作中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①其实，1990年代以来，荒诞现实主义已经成为“中国小说中最为活跃，也最受关注的一支”。诸如莫言的《酒国》，阎连科的《受活》《日光流年》《坚硬如水》，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我的阴阳两界》，余华的《兄弟》等都是典型的“中国牌的荒诞现实主义”。然而，尽管荒诞现实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从未中断，但2017年在短篇小说中如此集中地“爆发”，确实需要我们进一步地探讨与深思。

刘庆邦《红棉袄》讲述的是，农民游聪本曾当过乡镇干部，还差一点当上副乡长，因为想打乡长女儿的主意却误撞到乡长床前而丢了工作。回到游老庄后，无所事事，成天坐在藤椅上，晒太阳，看报纸，给一些游手好闲的村民读无聊的花边新闻。仗着有点文化，他处处卖弄，为了证明自己搞女人的本事，他独出心裁，给村里每个与他相好的女人都买了一模一样的红棉袄，还大言不惭：“成绩是用来统计的，没有统计就显不出成绩”。“游聪本的得意之处在于，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谁的本事大，谁搞的女人就多。而像他这样，把他搞过的女人一一标记出来，让别人知道，恐怕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发明创造吧！”刘庆邦以反讽的笔调通过游聪本这个人物，揭示出社会风尚腐败到极端时突破人伦底线的可能，正如文本所写的：“过去说万恶淫为首，谁要是偷了别人家的女人或男人，那是很丑很丢人的事，掖着藏着唯恐不及。现在却成

^① 刘志荣：《近二十年中国文学中的荒诞现实主义》，《东吴学术》，2012年第1期。

了一件可以骄傲、可以炫耀的资本，这是怎么了？人的良心到哪里去了呢？真的可以不要脸面了吗？”与刘庆邦以往的创作一样，《红棉袄》蕴藉着强烈的道德判断力和道德激情，但并没有显示任何救赎的姿态，其平静的、不露声色的叙述夹杂着含蓄的讽刺与批判，从而将一个荒诞的故事进行了富有寓意和吸引力的升华。在文本的最后，游聪本念了一段关于提倡乡贤文化的报纸评论，“游聪本解释说：乡贤文化是乡村的传统文化，乡贤都是有文化、有威望的贤达之人，代表着乡村的思想高地和道德高地。解释完了，游聪本接着问：你们说我是不是咱们游老庄的乡贤？这次有人给出了回答，说那是的，你要不是乡贤，游老庄就没有乡贤了”。对于如此荒诞的无耻，刘庆邦克制着叙述的情感，让我们看不出任何倾向性，他把所有有关道德的判断都交给了读者，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说：“严肃的小说家是实实在在地思考道德问题的。他们讲故事。他们叙述。他们在我们可以认同的叙述作品中唤起我们的共同人性，尽管那些生命可能远离我们自己的生命。他们刺激我们的想象力。他们讲的故事扩大并复杂化——因此也改善——我们的同情。他们培养我们的道德判断力。”^①我想，正是因为有了像刘庆邦这样的严肃的小说家，我们才会对文学致敬。

如果说刘庆邦深入到他熟悉的生活，以浓郁的写实笔法贴近现实，揭示出整个社会近乎荒诞的道德堕落；那么，同样以写实见长的储福金，则以反讽与审视式的态度，突破了日常生活的秩序，把事物的具象逐一撇去，让读者看清了被遮蔽在“现实”背后的人存在的根本。《前面向前，后面向后》开篇的第一句话就呈现出这种形而上的意味，“人生中的一辆车，开着开着就偏了道。”小公务员容一石正是乘坐这辆车随单位同事集体旅游，在一个边远城市的古玩市场上淘得了一块玉石。本来他并未将这块三十块钱的玉石放在心上，谁料大名鼎鼎的收藏家杨大成却“说得那么肯定，似乎还不止五万，也许是十万三十万”。于是，这块身价陡增的“灵通宝玉”便以神秘的姿态悄悄介入到容一石的生活中。容一石突然当了官，这让他对“灵通宝玉”更是爱不释手，如同一块能够通灵的护身符。然而，就在容一石顺风顺水之际，杨大成被揭露原来只是

^① 苏珊·桑塔格：《同时：小说家与道德考量》，《同时：随笔与演说》，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219页。

个忽悠大师，“灵通宝玉”的身价自然也就一落千丈。而此时，容一石所在的科室撤了。“容一石想他们科室，似乎原来是排着队的，前一个是科长，在他后面是年轻科员。现在前面的往前去了，后一个向后去了。他一个人像是那块遭贬损的玉一样，独自立在床头柜上。”显然，这篇小说中，储福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成规和精心构建起来的情节结构，然而，在对这一荒诞事件的思考上却富有明显的哲学取向，将人性中向上的坡度和向下的滑行，人生的错位与诉求，生存缝隙中的艰难挣扎都凝固在一块小小的玉石中。读罢小说，我们不禁掩卷而思：是一块真伪难辨的玉石在冥冥之中左右着我们的内心，还是我们的内心被自我所纠缠？问题的答案或许并不明朗，其实也无需明朗，毕竟，我们在追问的过程中已经听见了寻常生活中某些不寻常的回声。

与刘庆邦、储福金更多地贴近写实不同，范小青的《千姿园》则由现实经验的触及，发而为荒诞恣肆的想象。文本中的“我”在一家房屋中介工作，自认为很有销售经验与技巧，与一位大妈完成了一笔轻松的交易，感觉“钱赚得比较爽”。谁知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笔貌似赚到的交易，后患无穷，大妈的售后电话没完没了：热水器坏了、灯泡坏了、电视缴费出了问题，就连淋浴帘烂掉，也要打电话索赔，搞得“我”焦头烂额。更可怕的是，警察忽然找到“我”，说“我”犯了诈骗罪，已被法院定罪，搞得“我”一头雾水。结果发现还真有一个与“我”同名同姓，身份证信息、住址和工作单位的门牌号码都一模一样的人，这个人甚至还有一个与“我”那个难缠的客户一模一样的客户。于是，文本的最后“我”只能自嘲：“呵呵，他这是把他当成我了？或者，是我把自己当成他了？”的确，在一个多声部的世界上，可能会发生无数令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正如小说的题目“千姿园”。面对千姿百态的世态万象，我们时常会自我迷失，让想象中的自我压倒生活中的自我，最终在自我求证的过程中，被自己的谎言和制造的幻觉所击倒，甚至迫使自己认同自己的幻觉，把别人的故事当作自己的故事。范小青书写的这个貌似荒诞无稽的故事其实蕴含了最深刻的人性命题：人，到底是简简单单黑白分明一成不变，还是既善亦恶，时善时恶？我想，这正是荒诞背后留给我们的思考。

王祥夫的《怀鱼记》是一篇带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品。文本的主人公老乔桑“当年可是个打鱼的好手”，但现在这条被称为“胖江”的江里已经没有

鱼了，“忙乎一天也只能零零星星搞到几条指头粗细的小鱼”。一天，老乔桑在城里工作的儿子给他带回一条“大得实在让人有点害怕的灰鱼”，并告诉他只要下大雨一泄洪，就能把水库里的大鱼都冲出来，“一条接着一条，让你抓都抓不完”。于是，老乔桑和全村人都翘首企盼即将来临的大雨。然而，盼望的大雨没有来，倒把老乔桑盼疯了，“他见人就说，有一条很大的鱼就在他肚子里，很大一条很大一条，这么大一条”。我认为，如果仅仅把《怀鱼记》看作是一篇讲述环保的作品，就过于简单化了。那样的话，王祥夫完全可以采用更荒诞的手法去写，比如像卡夫卡《变形记》那样，让老乔桑变成一条鱼，以肆意的扭曲变形而发人警醒。实际上，《怀鱼记》中，王祥夫通过老乔桑这个人物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精神状况的变异。我们看到，引发老乔桑“怀鱼”的症结，不在于河里的鱼没有了，而是一次次叩问河里的鱼哪里去了？无数次没有结果的叩问不仅变成了一个人的精神灾难，而且，其深刻的寓意已经延伸到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反思，那就是，加速度发展的局部用力过猛而导致根部的深层断裂，这是现代文明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悖论。在此，我想到了王祥夫的另一个短篇《驶向北斗东路》，一个富有戏剧色彩的故事，提出的同样是断裂的问题：文化之根、精神之根断裂后，人与人之间相处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那些最为基本的道德标准是否仍然应该坚持？所以，《怀鱼记》胖江里鱼的枯竭，绝不仅仅是生存资源的枯竭，毕竟不能打鱼，人们还可以种菜，还可以进城，还可以有很多种生存方式，甚至更好的生存方式。但是，对于老乔桑而言，打鱼已经成为他的精神原乡，鱼的枯竭直接导致的是精神的萎缩。可见，精神与文明的断裂与重建，是王祥夫创作中一以贯之的思考，正是在不懈地追溯一个民族的精神源头中，他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中国故事的讲述。

3

入选最佳短篇小说的这18篇作品，无疑代表着本年度短篇小说创作的“高峰”，尽管我没有能力全方位梳理出它们在创作上的总体趋势，但这并不影响这些作品的审美价值和社会意义，当然，还有我对这些作品的喜爱与欣赏。

鲁敏的《火烧云》再一次暴露了她文学写作的“野心”。鲁敏在谈到新作

《荷尔蒙夜谈》时，坦言“我一直都不隐瞒我有野心，我认为优秀的写作者都是如此。为什么我会不安心于世俗、不能够很从容地应付日常，可能就是因为有这种缥缈的野心。但是这个野心很难具体地说它到底是什么，可能就是希望做到最好和最大”^①。《火烧云》便是在这样“野心”的驱使下，完成的一个有关灵魂与肉身、俗世与出世的故事。文本中的居士本来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副教授，不知受到怎样的精神创伤使他放弃了大好前途，独自来到山顶“几间旧屋”隐居，还给自己所居的小屋起名“云门”。居士每天的生活除了喝茶、抄经，就是接受访客们宣泄出的负能量。他们“掏出那些痛苦，讲述中淌出无助的眼泪，有的放出声音来哭，包括男人、老人。居士耐心地听，极少询问或劝解，他们并不需要。讲完了，情绪就好了一小半。然后会跟着居士四处巡走一番，他们从各个角度询问居士的过往与现在的生活细节”。居士的生活就这样平静地一天天滑过。然而，忽然有一天，平静被一个女子打破，女子咋咋呼呼上山，强行住进“云门”，也以“居士”自称。女子的到来，让“云门”一下子有了红尘的气息，“旧木桌子上突然显得花花绿绿”，而女子每天断断续续、没心没肺地讲述自己的经历：少不更事时被强奸，怀孕，父亲狠心离开了她。她从此自甘堕落，漂泊、打工，被一个个男人蹂躏、抛弃，竟然两次卖掉自己的孩子……女子酣畅淋漓、不动声色的讲述，就像是在讲述一个陌生人的故事。然而，她的讲述却奇迹般地解开了居士尘封的心结。居士把“云门”让给女子，下山回归了世俗的生活。而这个拯救居士的女子，却最终与“云门”一起葬身火海。读罢文本，我隐隐感觉到这个故事与民间传说中红莲柳翠的故事有着隐秘的勾连。修行多年的玉通和尚，被仇家陷害，在一夜间被妓女红莲破了戒，羞愤自尽。转世投胎为仇家女儿柳翠，沦落风尘，伤风败俗，却一经点明，立时顿悟成佛。所以，对肉体的禁锢绝不可能达到道德的完善，就像文本中的居士，时时刻刻都生活在肉体与精神相互博弈的纠结中。他想要远避尘世，却从未真正离开。他住在“四十分钟即可到顶”的“云门”，让自己做一个介于和尚与凡人之间的居士；所抄的经文“一笔一画，一个字一个字。他个个认得，又字字含糊”；就连“云门”二字，也给人模糊不清的含义：法号，斋名，还是山

^① 鲁敏：《我有一种缥缈的野心》，《扬子晚报》，2017年2月6日。

名？而肉体的“瘙痒症”更是无声地诉说着他内心深处无法遏制的欲望。所以，居士的归隐只是一种象征，甚至是一种自欺欺人。相反，那个天天写着购物清单，仿佛俗不可耐的女子，却最终选择了心如止水，决绝地告别尘世。或许，在经历过人世的沉沦后，反而能领悟人生的真谛，一如传说中那个立地成佛的柳翠。

叶兆言的小说素来有“好读不好懂”的特点。陈思和教授曾指出，叶兆言的文字表达很适合阅读，但读后每每给人以云遮雾罩之感。我在阅读这篇《滞留于屋檐的雨滴》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读罢文本，首先令我最为惊叹的是，文本中那些层层叠叠悬念的铺设。叶兆言无疑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他能在从容不迫的叙事节奏中讲述扣人心弦的故事。凌蒙初在《拍案惊奇序》中说：“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譎诡幻怪非常理测者固多也”，强调在日常题材、平凡故事中彰显小说的传奇性，也就是所谓的“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我认为，叶兆言深谙此道，他往往能够给家常的柴米油盐加上几味奇异的香料，让作品呈现出“无奇之所以为奇”。《滞留于屋檐的雨滴》中的陆少林与父亲感情深厚，但就在父亲过世的那一天，他获悉了一个惊天秘密：“这个刚死去的男人，并不是陆少林的亲生父亲”。于是，一连串的问题困扰着陆少林：养父为什么对他最好，反而对自己的亲生女儿要疏淡得多？养父为什么明知妻子出轨，还要对她百依百顺？自己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所有这些问题如同滞留于屋檐下的雨滴，欲滴未滴，悬而未决。在此，叶兆言的“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并非是要刻意制造一些无奇之奇，而是通过一个人平凡而又不寻常的人生轨迹，探究一个古老却令人困惑的问题：我是谁？这是每一个个体存在的生命诉求。拉康认为，对完整的自我形象的渴望和迷恋是人之天性，但人恰恰是在以他者为参照物的自我身份确认的过程中，迷失了真实的本我，这是一个无法克服的悖论，这一悖论导致人类不得不永远承受背离真实生命动机的命运。其实，陆少林的命运不也是如此吗？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化作屋檐下的雨滴，也化作他无法承受的生命之轻。

近年来，温州作家东君的小说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他的不拘一格，他的求异求新，使其作品总是透出勃勃的生机。《好快刀》类似鲁迅的《故事新

编》，取材于《聊斋志异》中仅一百余字的同名短篇。原作中的刽子手刀法炉火纯青，手起刀落之际，落下的头颅大赞：“好快刀！”一股豪气顿然生起，既是刀法之豪气，亦是头颅之豪气！东君对这颗“说话的头颅”做了全新的演绎，引导我们从理智与情感之外，重新去认识我们肉身的本能。文本中“我”是一个浑身长满鱼鳞的“怪物”，受尽冷眼歧视。“我”最大的愿望是能够像普通人一样，“有个一辈子都属于自己的女人”。所以，当跟“我”娘一样温和、柔弱的静莲师太圆寂后，“我”竟在莫名的冲动下偷走了静莲师太的尸身。静莲师太圆寂时身相如生，被称为肉身菩萨。所以，“我”的行为是对神灵的亵渎，引发了众怒，引来杀身之祸。于是，本是出自对肉身的敬畏，结果却导致自我肉身的毁灭。在我看来，《好快刀》的寓意是多层的。或许，肉身的毁灭恰恰是放飞灵魂的契机，“我心里居然还滋生出一种要跟身体就此诀别的紧迫感”。或许，肉身是空，灵魂也是空，毕竟，“梦这东西，到头来还是随了身体，一并消散。都是空的，都是空的”。或许，肉身与灵魂并非水火不相容，“一念成佛，一念成魔；手上即便有刀，心里也要有佛”。我想，东君的过人之处，正是这样能在卡佛般的极简书写中传递出无限的厚重。与《好快刀》相仿，叶弥的《下一站是天堂》也颇有《聊斋志异》笔记体传奇的味道。四个小故事独立成篇，讲述了形色各异的鬼。有“可以让你毁灭，也可以让你新生”的楼梯鬼；有爱花如痴的鬼大伯；有专门掠夺孩子生命的顽皮鬼；有令人毛骨悚然的钥匙鬼。尽管我不能完全明了叶弥借助这些鬼故事想要如何地抒怀写心，但她貌似轻松而略带恍惚的叙述，却的确引发了我内心的恐惧。当然，鬼故事就是要让人害怕的，但叶弥文本中那种笼罩着江南烟雨的诡异之气，却使得恐惧不是因为恐惧引起，而是为了一种尖锐的孤独和悲伤。或许是因为同为苏州作家，与叶弥一样，王啸峰的小说也时常弥散着潮湿与阴翳。《隐秘花园》中那个隐藏在隐秘花园中的白袍老人槐树精，不是同样裹挟着一股湿漉漉的鬼气吗？所不同的是，《隐秘花园》并不晦涩，文本的最后点明了主旨：是不是每个人内心有了隐秘世界，才会对应出现隐秘花园？其实，文学自身又何尝不是一个隐秘花园呢？让劳累了一天的我们，躲开俗世的纷争，在夜晚的床头灯下自由惬意地栖居。

当然，文学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对世情“拿起”和“放下”之后的平静，还有对这个时代人性的理解和深刻洞察。我始终认为，短篇小说对现实、生活

和存在具有非凡的穿透力，“它对于生活所构成的绝不是普通的压力，而是巨大的压强”^①。这种压强不一定非要来自惊心动魄的故事，也不一定非要依赖大的人物形象或能够显示时代力量的宏大命题叙述。那些日常起居中流淌出的“生活流”，一个个平凡生命的记忆与眷恋，都可以建构起最朴素、最实在的精神命意。令我欣喜的是，这部书中的不少作品，都以如此的情怀，在字里行间散发出自然、平易和质朴的气息。葛亮的《暮色》书写一个即将走到生命终点的老者，在一封封邮件里诉说自己的一生。这些未必有人回复的文字，让涌动、涨溢着的生命浆汁从容地流淌出来，平实而绵长，那里面的意义与无意义组成的便是人生的暮色。张惠雯的《梦中的夏天》则截取生活的一个片段，在一个个精心的细部描写中，捕捉一瞬间人物的情感。曾经可望而不可即的女神，面对无情的命运，“像被无情地侵蚀、过早地凋谢了的一朵荒原上的小花”。于是，相遇的故事便注定只能发生在那个梦中的夏天。陈永和的《十三姨》同样也是苍凉而忧伤的，一场褪色的旧时代的爱情为我们留下一个略显沉重的故事。然而，正如陈永和所说，“小说很沉重，但不是当事者的沉重，是咀嚼当事者沉重后的沉重”。这种沉重感同样沉淀在裘山山的《调整呼吸》中。一次意外死亡，牵扯出人与人之间巨大的沟通障碍。在这个“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急攘攘蝇争血”的时代，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重新调整一下生命的呼吸呢？钟求是《街上的耳朵》写的是一次美丽的误会。那个曾经在瞬间打动主人公的女人其实并不美丽，但那个动人的瞬间却改变了两个男人一生的命运。或许，这就是命定的人生。读完这样的故事，会让人渗出丝丝缕缕的忧伤，最温暖的情节或记忆，总是隐藏着无数的慨叹和忧郁。

总体来看，2017年短篇小说“高峰”之作，在文体探索上走得更远，他们的写作有着明晰的方向性，不仅重视小说内在力量与外部形态之间的关系，努力探索小说结构可能产生的弹性和张力，而且在不断摸索、寻找一种短篇小说新的构思、虚构方法，试图在这种新的虚构可能性中，改变短篇小说的面貌。同时，这些优秀的小说家们，在他们的文本中极力去探寻世情、生命、记忆、遗忘和偶然的关系。或许，一个伟大的作家并不需要在他文本里解决什么问

① 张学昕：《穿越叙述的窄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7页。

题，也无需证实某种人生价值的合理性。他要做的是，依靠小说的智慧来刺激我们庸常的生活，让我们进入文学的世界，穿越世俗的表象，直抵真相背后的荒诞和遮蔽，由此去更加深刻地洞察人性。苏童说，小说是灵魂的逆光。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阅读小说的意义。

（梁海，女，哲学博士。现为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001	序 “小说是灵魂的逆光”	梁海
001	玛多娜生意	苏童
015	滞留于屋檐的雨滴	叶兆言
023	千姿园	范小青
039	红棉袄	刘庆邦
051	前面向前，后面向后	储福金
064	调整呼吸	裘山山
083	火烧云	鲁敏
104	怀鱼记	王祥夫
122	梦中的夏天	张惠雯
144	好快刀	东君
159	气球	万玛才旦
185	隐秘花园	王啸峰
202	白耳夜鹭	艾玛
222	街上的耳朵	钟求是
234	十三姨	陈永和
250	暮色	葛亮
258	下一站是天堂	叶弥